

姓氏距离如何影响移民创业？

——基于跨市失信视角的分析

马俊峰*

摘要：大规模的人口跨区域流动造就了外来人口创业活跃度高于本地人的“过江龙”企业家现象，助长了移民创业精神，对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包含姓氏信息的超大型数据库构造城市间姓氏距离指标，借助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构建的跨市失信指标，结合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考察以姓氏距离刻画的文化差异如何影响移民创业。与过往研究从社会融入视角解释文化差异阻碍移民创业不同，本文发现以姓氏距离表征的文化差异通过减少跨市失信来促进移民创业。背后的解释是，姓氏距离通过降低流入市对移民的信任程度，增加移民在流入市的失信难度、减少跨市失信行为，缓解地域性信用偏见，推动移民创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姓氏距离会促进同文化群内流动的移民创业，不影响跨文化群流动的移民创业，并且姓氏距离的移民创业推动效应随着地理距离增加而减少、制度距离增加而增加。研究结论表明，适度的区域间文化差异会促进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激发移民创业精神。

关键词：文化差异；姓氏距离；移民创业；社会信用；地区差距

DOI: 10.19313/j.cnki.cn10-1223/f.20250904.001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余年里，伴随工业化与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和就业机会空间分布不均衡的扩大，先后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等大规模的人口跨区域流动现象。早期人口向经济发展水平更高与营商环境更优的沿海地区迁徙与集聚更多是出于经济动机，比如寻找就业机会与创业商机。近年来，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与强省会战略的推进为流动人口在家门口就业创业创造了更适宜的环境，吸引了大量文化背景更相近的人口回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过去 10 年里流动人口的增量主要来自文化相近性更高的省内流动人口，表现为 2020 年全国流动人口为 3.76 亿人、跨省流动人口 1.25 亿人、省内流动人口 2.51 亿人，分别较 2010 年增加 1.54 亿人、0.39 亿人、1.15 亿人。基于经济动机的流动模式正逐渐向兼顾“诗与远方”的流动模式转变，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选择在经济动机与文化适应之间谋求平衡。

大规模的人口跨区域流动不仅改变了乡土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创造了流动中国的盛世景观，也造就了一批被称作“过江龙”企业家的异地创业弄潮儿。相较于“求安稳”的本地人而言，“爱折腾”的外地人创业意愿与概率更高（叶文平等，2018）。过往研究表明，农民工比流入地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创业意愿与概率更高（Liu et al., 2019），并且在地区间制度差距与经济差距较大时表现得更突出（叶文平等，2018）。推动移民创业不仅会为流入地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有助于

* 马俊峰（通信作者），广西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E-mail: majunfeng@gxu.edu.cn。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异质性劳动力配置、技术空间扩散与资本跨区域流动研究”（24XJC790007）、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边疆经济研究院创新培育项目“劳动力市场整合赋能一体化技术市场建设的机制与对策研究”（25ZGBJY04）的资助。

扩大就业市场规模和提高就业质量（马俊峰和徐子尧，2023），还对加快形成投资与消费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促进劳动力要素市场整合和构建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当前中国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与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交汇的艰难阶段，繁荣移民创业精神有助于扭转需求收缩、供给过剩和预期偏弱的局势。然而，学术界对移民创业影响因素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对本地创业者影响因素的重视程度，并且在分析移民创业影响因素时更关注国际移民创业而非国内移民创业。

相较于过往研究大量探讨国际移民创业的影响因素而言，现有文献对国内移民创业影响因素的关注程度略显不足。既有研究主要从单边视角考察国内移民创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入地宗族文化和文化多样性通过阻碍社会融入来抑制移民创业（马俊峰和徐子尧，2023；Cheng et al., 2022；Zhang et al., 2023），流出地创业文化和稻作文化通过社会网络渠道来促进移民创业（张博和范辰辰，2021；Yang and Zhang, 2023）。少部分研究从流入地与流出地双边视角考察了社会关系、地区差距和文化距离对移民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出地社会关系通过提供前期物质资本影响农民工创业决策、流入地社会关系通过提高后期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创业成功率（杨向阳等，2018），地区经济差距和制度差距会促进移民创业（叶文平等，2018），文化距离会限制移民生存型创业（Zhu et al., 2023）。

文化作为决定经济交换的重要但常被忽略的因素之一（Guiso et al., 2009），文化差异会导致地区间信任程度下降，降低流入地对外来人口的信任程度（林建浩等，2018），流入地对外来人口信任程度降低会影响移民创业。然而，流入地对外来人口信任程度降低究竟会抑制移民创业，还是会促进移民创业，目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一方面，文化差异导致流入地对移民信任程度下降会阻碍社会融入，进而抑制移民创业（马俊峰和徐子尧，2023；Amin, 2019；Cheng et al., 2022；Zhang et al., 2023）。另一方面，文化差异导致流入地对移民信任下降会增加移民在本地失信的难度，失信难度增加会通过社会监督和声誉约束渠道减少移民在流入地的失信行为（唐林等，2019；吴晶妹等，2023；周洲等，2022），缓解地域性信用偏见，推动移民创业。

为打开文化差异影响移民创业的黑箱，本文利用 1.73 亿条全国工商注册企业法人姓氏信息数据构造城市间姓氏距离指标，以姓氏距离刻画文化差异，结合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考察姓氏距离对移民创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与过往研究持有文化差异通过阻碍社会融入抑制移民创业的观点不同，本文发现以姓氏距离刻画的文化差异通过减少跨市失信促进了移民创业，尤其是机会型创业。机制检验表明，姓氏距离通过降低流入市对外来人口信任程度来增加失信难度、抑制跨市失信，跨市失信减少会减轻地域性信用歧视，推动移民创业。异质性检验表明，姓氏距离的移民创业效应因流动方向而异，表现为姓氏距离对同文化群内流动的移民创业有促进作用，对跨文化群流动的移民创业无显著影响，并且姓氏距离的移民创业推动效应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减少、随着制度距离的增加而增加。相较于过往研究而言，本文的学术贡献体现在三方面：

（1）丰富了移民创业影响因素的文献。现有研究主要从社会融入（马俊峰和徐子尧，2023；Zhu et al., 2023）、社会包容（Cheng et al., 2022；Zhang et al., 2023）、社会网络（张博和范辰辰，2021；Yang and Zhang, 2023）等角度解释流入地或流出地单边文化特征如何影响移民创业，少部分研究探讨了流入地与流出地双边文化距离对移民创业的影响（Zhu et al., 2023）。与过往研究不同，本文发现姓氏距离会促进移民创业。为打开姓氏距离影响移民创业的黑箱，本文利用全国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构造跨市失信指标，分析姓氏距离如何通过减少跨市失信，推动移民创业，丰富了移民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

(2) 拓展了文化差异经济效应的文献。过往研究主要分析国家间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 (Guiso et al., 2009)、跨国投资 (Karolyi, 2016)、跨国经营 (Gorodnichenko et al., 2024)、国际移民 (Krieger et al., 2018) 等影响, 以及区域间文化差异对创新差距 (阮建青等, 2016)、技术扩散 (林建浩和赵子乐, 2017)、产业联系 (Mao and Mao, 2023) 和区域经济发展 (高翔和龙小宁, 2016) 等影响, 个别研究发现文化距离会抑制移民生存型创业 (Zhu et al., 2023)。与此不同, 本文利用全国工商注册企业法人姓氏数据构建姓氏距离指标, 考察姓氏距离如何影响移民创业, 丰富了文化差异经济效应的研究。

(3) 丰富了社会失信经济后果的文献。既有研究大多关注社会失信如何影响本地家庭创业 (徐子尧和马俊峰, 2022) 和本地民企发展 (余泳泽等, 2020) 等, 对跨市失信经济后果探讨较少。本文借助全国失信被执行名单数据构建跨市失信指标, 以失信被执行法院所在市与身份证号所在市是否相同来判断是否为跨市失信, 研究发现以跨市失信刻画的地域信用偏见会阻碍移民创业, 姓氏距离的社会监督与声誉约束效应会减少跨市失信, 进而促进移民创业, 拓展了社会失信经济后果的文献。

剩余部分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 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 第五部分为机制检验, 第六部分为异质性分析, 最后为进一步讨论。

二、文献综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文献综述

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文献有两支: 一支是考察文化差异经济效应的文献, 另一支是分析移民创业影响因素的文献。

从文化差异的经济效应来看, 过往研究可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聚焦于考察国家间文化差异的经济效应, 另一部分集中于分析区域间文化差异的经济效应。从国家间文化差异来看, 现有文献主要探讨文化差异对发展扩散、国际贸易、跨国投资、跨国经营、国际移民等的影响, 发现国家间文化差异与收入差距正相关 (Spolaore and Wacziarg, 2009)。国家间文化差异不仅会增加贸易成本, 阻碍国际贸易 (Guiso et al., 2009; Gokmen, 2017; Fensore et al., 2022), 也会阻碍资本跨国流动, 制约跨国并购、跨国投资和跨国经营 (Siegel et al., 2011; Ahern et al., 2015; Gorodnichenko et al., 2024), 还会削弱文化与身份认同, 阻碍国际移民 (Belot and Ederveen, 2012; Adsera and Pytlikov, 2015; Lanati and Venturini, 2021)。从区域间文化差异来看, 既有研究大多分析文化差异如何影响创新差距、技术扩散、产业联系、劳动力流动、市场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等。研究发现, 文化差异不仅会扩大技术创新差距 (阮建青等, 2016)、阻碍技术传播与扩散 (林建浩和赵子乐, 2017) 和减少区域产业横向联系 (Mao and Mao, 2023), 也会通过信息沟通和身份认同渠道制约劳动力跨区域流动 (李仲达等, 2021), 还会提高商品市场分割程度 (丁从明等, 2018), 增加跨区域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的交易成本, 制约区域协调发展 (高翔和龙小宁, 2016)。

就移民创业的影响因素而言, 相关文献可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研究从流入地或流出地单边视角分析移民创业的影响因素, 另一部分研究从流入地与流出地双边视角考察移民创业的影响因素。从

流入地或流出地单边视角来看,研究发现流入地最低工资制度通过促进受雇就业和影响社会认同来抑制流动人口创业(李经和陈勇吏,2018),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激发数字化创业资源吸引外市人才前来创业(焦豪等,2023),宗族文化通过阻碍社会融入抑制移民创业(马俊峰和徐子尧,2023),文化多样性通过增加创新资源可及性和社会包容性推动农民工创业(Cheng et al., 2022)、通过阻碍社会融入抑制移民创业(Zhang et al., 2023),社会包容性通过增加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促进移民创业(周颖刚等,2020);户籍地创业文化通过社会网络和推广榜样等渠道推动移民创业(Yang and Zhang, 2023),稻作文化通过强化熟人社会关系激发移民创业精神(张博和范辰辰,2021)。从流入地与流出地双边视角来看,研究指出双边社会关系通过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渠道推动农户异地创业(杨向阳等,2018),经济差距和制度差距会推动移民创业(叶文平等,2018),文化价值距离会抑制移民创业(Zhu et al., 2023)。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既有研究主要从流入地单边视角考察宗族文化、文化多样性对移民创业的影响,从流出地单边视角考察宗族文化、创业文化、稻作文化对移民创业的影响,少部分研究从流入地与流出地双边视角分析地区差距和文化距离对移民创业的影响。本文还发现过往研究大多认为文化差异通过社会融入、社会包容和社会网络等渠道阻碍移民创业。与此不同,本文从跨市失信视角考察文化差异对移民创业的影响,旨在为政府制定有助于激发移民创业精神的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为打开姓氏距离影响移民创业的黑箱,本文在姓氏距离会降低流入市对外来人口信任的基础上,从两种视角分析作用机制。其一,与过往研究类似,本文提出姓氏距离刻画的文化差异导致的流入市对外来人口信任下降通过阻碍社会融入来抑制移民创业。其二,与过往研究不同,本文提出姓氏距离刻画的文化差异导致的流入市对外来人口信任下降通过减少跨市失信来促进移民创业。鉴于此,本文提出两条对立假说,分别称为社会融入机制与跨市失信机制。

1. 社会融入机制。以姓氏距离刻画的文化差异通过降低流入市对外来人口信任,阻碍移民社会融入。林建浩等(2018)指出文化差异是决定信任关系的制度基础,利用中国企业家调查构造省际双边信任指标,发现省份间存在信任不对称现象,获得高信任的省份未对其他省份展示同等水平信任,以基因距离和姓氏距离刻画的文化差异是导致信任不对称的重要成因。具体而言,流入市对外来人口信任下降对社会互动、文化习得、身份获取和心理认同四种维度的社会融入具有负面影响。从社会互动来看,被信任是外来人口融入本地社会网络的必经途径,过往研究指出文化背景相似是信任基础,流入地宗族文化的小圈子属性导致外来人口减少与本地人来往、增加与同乡来往,阻碍了移民社交融入(马俊峰和徐子尧,2023)。从文化习得来看,被信任是外来人口接纳本地文化习俗的必要条件,既有研究发现流入地文化多样性不利于形成稳定的信任关系,会提高文化适应成本,抑制移民文化融入(Zhang et al., 2023)。从身份获取来看,被信任是外来人口获取主人翁身份的必需保障,过往研究发现省际文化差异会削弱身份认同,阻碍人口跨省流动,制约移民身份融入(李仲达等,2021)。从心理认同来看,被信任是外来人口在心理层面融入本地的必备基础,现有研究表明稻作文化差异反映出基于亲缘与地缘形成的社会关系不同,会制约外来人口通过情感支持渠道获取创业资本,阻碍移民心理融入(张博和范辰辰,2021)。

社会融入受阻会抑制移民创业。现有研究基本就社会融入有利于移民创业的观点达成一致意

见。Cheng 等（2022）研究表明，流入市文化多样性通过创新资源可及性和社会包容性渠道促进农民工创业。Zhang 等（2023）研究发现，流入地饮食偏好多样性阻碍了异地创业。马俊峰和徐子尧（2023）研究指出，流入地宗族文化通过社会互动、文化接纳和心理认同渠道阻碍了移民创业。基于此，本文提出以姓氏距离刻画的文化差异会阻碍移民创业的假说：

假说 1：姓氏距离通过阻碍社会融入，减少移民创业意愿与概率。

2. 跨市失信机制。以姓氏距离刻画的文化差异会降低流入市对外来人口的信任。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指出省份间存在信任不对称现象，获得高信任省份未对其他省份展示同等程度信任。林建浩等（2018）发现文化差异是造成信任不对称现象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姓氏距离会通过沟通障碍、价值观冲突、社会群体隔阂三方面影响流入市对外来人口信任。首先，以姓氏距离刻画的文化差异会影响沟通方式，移民与本地人的语言障碍会限制信息传递，导致本地人对移民行为意图的误解，降低流入市对外来人口的信任。Wei 等（2019）研究发现文化差异会影响外来人口在流入地获取信任，限制移民创业所需的社会网络。其次，以姓氏距离刻画的文化差异会造成价值观冲突，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具有差异化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和社会期待，移民行为规范与本地社会期待不一致会引起流入市对移民信任程度下降。Zhang 等（2023）指出文化多样性增加了群体间价值观与行为规范冲突，导致本地包容性下降、对外来人口社会期许提高，增加外来人口获取本地信任的成本。最后，以姓氏距离刻画的文化差异会产生社会群体隔阂，外来人身份标签会拉大移民与本地人的心理距离，增加获取信任的难度。马俊峰和徐子尧（2023）指出宗族是区分身份特征的显著符号之一，宗族文化导致本地人排外性增加，阻碍移民获取信任。

流入市对外来人口信任降低会从社会监督和声誉约束两方面抑制外来人口在流入市的失信行为。从社会监督来看，流入市对外来人口信任降低会强化本地人对外来人口的防范心理，导致外来人口在流入地“做坏事”的难度增加，有助于约束外来人口的跨市失信行为。唐林等（2019）指出农户出于群体认同和面子观念会在村干部监督和保洁员监督下进行更积极的生活垃圾集中化处理。从声誉约束来看，由于流入市对外来人口信任降低反映了本地对外来人口存在信用偏见，移民出于维护个人声誉和重塑家乡形象的考虑，会在声誉约束下减少跨市失信。吴晶妹等（2023）发现在市场惩罚失灵的环境领域，环保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会使环境违法违规的公司受到声誉惩罚。周洲等（2022）指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作为公权力担任执行者的第三方声誉惩罚机制，通过提高社会诚信水平和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畅通银行信贷获得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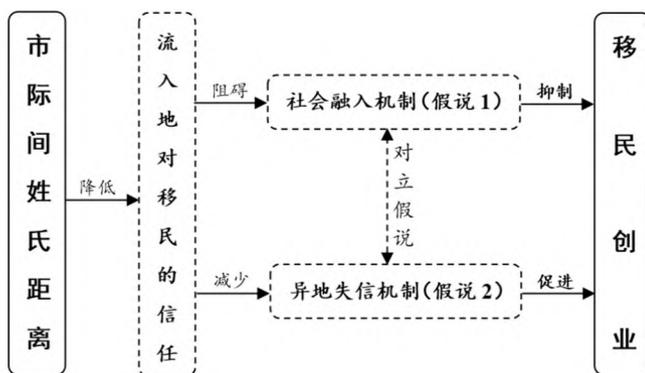


图 1 理论框架：姓氏距离影响移民创业的两重解释

跨市失信行为的减少有助于纠正本地人对外来人口信用不足的地域偏见，降低跨区域创业的交易成本（刘凤委等，2009），推动移民创业。户籍地居民在流入地失信减少会缓解流入地居民对户籍地信用缺失和信用不足的地域偏见，降低重新建立信任关系需要付出的交易成本（刘凤委等，2009），促进移民创业。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姓氏距离刻画的文化差异会促进移民创业的假说：

假说 2：姓氏距离通过减少跨市失信，增加移民创业意愿与概率。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三部分数据完成研究设计：一是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构造移民创业意愿和移民创业选择指标；二是利用全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库法人姓氏信息构造城市间姓氏距离指标；三是利用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构造跨市失信指标。

1. 移民创业。参考马俊峰和徐子尧（2023）的方式，构建移民创业意愿和移民创业选择两个指标，数据来自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CMDS）。CMDS 是国家卫生健康委自 2009 年起进行的一项年度全国性流动人口抽样调查项目，调查内容包括流动人口及家庭成员基本信息、就业与创业情况、流动范围和趋向、收支和居住、子女流动和教育、心理文化等，是目前国内研究移民创业问题时间跨度最久、样本规模最大和执行部门最权威的数据源，样本质量较高。值得说明的是，与国家统计局以离开户口所在地并跨乡镇街道居住半年以上作为流动人口的划分标准不同，卫生健康委是将离开户口所在地并跨乡镇街道居住一个月以上的群体视作流动人口。使用 2017 年 CMDS 的原因是，自 2009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开展以来，仅 2017 年同时收录了流动人口户籍地和流入地城市信息，同时具备户籍市和流入市行政代码是本文开展研究的前提。

2. 姓氏距离。参考 Bai 和 Kung（2022）、马俊峰和徐子尧（2025）的做法，本文借助 1.73 亿条全国工商注册企业法人姓氏信息构造城市间姓氏距离。在稳健性检验中，汇报了基于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和 2008 年全国经济普查构造的城市间姓氏距离指标结果。姓氏距离构造过程如下所示：

首先，参考 Bai 和 Kung（2022）利用姓氏分布频率刻画姓氏距离指标来考察人口结构动态变化的思路，本文构造城市内部姓氏相似性指标：

$$d_j = \sum_{n=1}^N p_{jn}^2 \quad (1)$$

其中， d_j 代表城市 j 内部姓氏相似性， N 为全部姓氏数量， p_{jn} 为姓氏 n 在城市 j 占的比例。

其次，计算城市 h 与城市 j 之间的姓氏相似性（ d_{hj} ）。具体定义如下：

$$d_{hj} = \sum_{n=1}^N p_{hn} \times p_{jn} \quad (2)$$

其中， p_{hn} 和 p_{jn} 分别为姓氏 n 在城市 h 和城市 j 占的比例。

最后，计算标准化的城市 h 与城市 j 之间姓氏相似性指标（ d'_{hj} ），以及城市 h 与城市 j 之间姓氏距离指标（ D_{hj} ）。具体定义如下：

$$d'_{hj} = d_{hj} / \sqrt{d_h d_j} \quad (3)$$

$$D_{hj} = -\ln \left(d_{hj} / \sqrt{d_h d_j} \right) \quad (4)$$

相较于过往研究以方言距离和基因距离刻画文化差异而言，本文使用超大型数据库构造城市间姓氏距离指标，具有如下优势。一是姓氏距离可刻画文化差异渐变而非突变的特征，这是离散型方言距离（是否属于同方言区或方言片）所不具备的优势（丁从明等，2018）。二是姓氏距离借助可识别行政区划的姓氏源构建得来，避免了行政区划与文化分布不一致的问题，这是以连续型方言距离刻画姓氏距离所不具备的优势（高翔和龙小宁，2016）。三是姓氏距离覆盖的城市对数量更多，这是以基因距离刻画姓氏距离所不具备的优势（阮建青等，2016；林建浩等，2018；李仲达等，2021）。

3. 跨市失信。本文以跨市失信案件数量和人均案件数量、跨市失信人口数量和人口比例衡量跨市失信，跨市失信人均案件数量以每万户籍市人口在流入市失信的案件数量表示，跨市失信人口数量以每万户籍市人口在流入市的失信人口数量表示，数据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对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以达到维护申请执行人正当权益和正常社会经济秩序的目的。被列入名单的原因包括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以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违反财产报告制度；违反限制消费令，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

由于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披露的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需要填入被执行人身份证号和姓名信息方能进行查询，无法批量查询过往失信人信息，因此本文借助百度搜索引擎失信人查询小程序完成数据搜集工作，失信人查询小程序的原始数据来自最高人民法院。首先，本文利用计算机程序抓取包含身份证号和执行法院所在地信息的失信被执行人自然人名单，以此作为构造跨市失信指标的数据源，获取的信息包括失信人姓名、无出生月日的身份证号、执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被执行人履行情况、立案年月日、公布年月日等。其次，本文提取身份证号前四位并将其转化为对应的行政区划代码，利用高德地图地理编码服务将执行法院所在地的结构化地址信息转化为经纬度信息，再借助高德地图逆地理编码服务将经纬度信息转化为行政区划代码。然后，判断失信被执行人是否为跨市失信。跨市失信判断标准如下：如果身份证号码的城市行政代码与执行法院的城市行政代码不一致，则视为跨市失信，如果身份证号码的城市行政代码与执行法院的城市行政代码一致，则视为本市失信。

考虑到存在同一自然人同一年份在同一城市多次失信的现象，故剔除了重复失信的样本，即将同一自然人同一年份在同一城市的多次失信视为一次失信，以失信人口数量而非失信案例数量刻画跨市失信，构建跨市失信人口数量和人口比例指标。需要说明的是，获取的失信被执行人数据不包含因履行完毕义务已从失信名单中退出的样本，本文以 2016 年跨市失信案件数量和人均案件数量、跨市失信人口数量和人口比例匹配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通过将解释变量进行滞后 1 期处理来减轻反向因果问题。

（二）计量模型设定

为检验姓氏距离对移民创业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线性概率模型：

$$Entrepreneurship_{ijh} = \beta_0 + \beta_1 Surname_{jh} + \beta' X_{ijh} + industry_j + province_j + Province_h + \varepsilon_{ijh} \quad (5)$$

式中，被解释变量为户籍市 h 外来人口 i 在流入市 j 的创业情况，包括创业意愿和创业选择，解释变量为姓氏距离。 X_{ijh} 为控制变量矩阵， β' 为控制变量系数矩阵，控制了移民个人特征、家庭特

征、户籍市与流入市差异特征。为避免受到行业和省份层面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本文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 (*industry*)、流入省固定效应 (*province_i*) 和户籍省固定效应 (*Province_h*)。为便于解释系数的经济学含义，本文将解释变量和连续型控制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三)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移民创业，包括移民创业意愿和移民创业选择。移民创业意愿以虚拟变量表示，如果移民未创业但因经商而流动，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移民创业选择以虚拟变量表示，如果移民就业身份为雇主或自营劳动者，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2. 解释变量：城市间姓氏距离，变量定义详见数据来源部分。

3. 控制变量：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流入市与户籍市差异特征变量。

(1) 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本文控制了流动人口的年龄(调查年份与出生年份之差)、性别(男性=1, 女性=0)、民族(汉族=1, 少数民族=0)、受教育时长(未上过学=0, 小学=6, 初中=9, 高中/中专=12, 专科=15, 本科=16, 研究生=19)、户口类型(农业户口=1, 其他=0)、政治面貌(中共党员=1, 其他=0)、健康状态(健康或基本健康=1, 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或生活不能自理=0)、婚姻状态(已婚=1, 其他=0)、住房状态(拥有自有住房=1, 否则=0, 自有住房包括自购商品房、自购保障性住房、自购小产权住房和自建房)、家庭收入(过去一年家庭平均月总收入的自然对数)、家庭支出(过去一年家庭平均月总支出的自然对数)、社区类型(居委会=1, 村委会=0)等特征。

(2) 流入市与户籍市之间差异特征包括无时变特征变量和有时变特征变量。首先，控制了无时变特征变量，包括河流密度之差(流入市与户籍市河流密度之差，河流密度等于河流渠道总长度与扣除行政区内水域面积的行政区面积之比，来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地形起伏度之差(流入市与户籍市地形起伏度之差，来自中国地形起伏度公里网格数据集)、坡度极差之差(来自地理遥感生态网平台)、到本省会城市距离之差(流入市与户籍市到本省会城市质心的空间距离之差)、到他省会城市距离之差(流入市与户籍市到本省以外的最近省会城市质心的空间距离之差)、到海岸线最近距离之差(流入市与户籍市到海岸线最近距离之差，来自全球高分辨率海岸线数据集)、到港口最近距离之差(流入市与户籍市到港口最近距离之差，来自中国港口统计年鉴)、驾车距离(流入市与户籍市质心驾车距离，来自高德地图驾车路径规划平台)、地理距离(流入市与户籍市质心地理距离之差)、方言距离(流入地与流出地区县属于同一方言片=0、属于同一方言区不同方言片=1、属于同一方言大区不同方言区=2、属于不同方言大区=3，来自汉族方言大词典)、宗教场所密度之差(流入市与户籍市宗教活动场所密度之差，宗教活动场所密度等于场所数量与人口数量之比，来自普渡大学、密歇根大学合建的空间宗教分析系统)、孔庙遗存数量之差(流入市与户籍市孔庙遗存数量之差，来自明清时期地方志)。其次，控制了有时变特征变量，包括户籍人口规模之差(流入市与户籍市户籍人口数量之差)、公共财政收支比之差(流入市与户籍市公共财政收支比之差，公共财政收支比等于地方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比，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经济距离(流入市与户籍市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制度距离(流入市与户籍市制度质量之比，制度质量等于地区生产总值与地方财政支出之比)。

(四) 描述性统计

表 1 为描述性统计结果。从移民创业来看，35%的流动人口具有创业意愿，42%的流动人口从事雇主或自营劳动者身份的创业活动。从移民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来看，移民平均年龄在 35 岁左

右,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 年, 已婚比例为 80%, 拥有自有住房的家庭不足 20%。从姓氏距离来看, 城市间平均姓氏距离为 0.1082, 大约相当于海南三亚与新疆乌鲁木齐、广东东莞与云南曲靖、辽宁抚顺与四川绵阳之间的姓氏距离。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中文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移民创业意愿	27838	0.3469	0.4760	0	1
移民创业选择	31458	0.4159	0.4929	0	1
城市间姓氏距离	31458	0.1082	0.1170	0.0007	0.9427
跨市失信案件数量	31458	118.2877	181.7074	0	1740
跨市失信人均案件数量	31458	0.0176	0.0305	0	0.2742
跨市失信人口数量	31458	37.6224	94.7398	0	1270
跨市失信人口比例	31458	0.0748	0.1900	0	3.4890
年龄	31458	35.6393	9.5673	15	80
性别	31458	0.5712	0.4949	0	1
民族	31458	0.9630	0.1887	0	1
受教育时长	31458	10.2823	3.1753	0	19
户口类型	31458	0.8109	0.3916	0	1
政治面貌	31458	0.0444	0.2061	0	1
健康状况	31458	0.8558	0.3513	0	1
婚姻状态	31458	0.8180	0.3858	0	1
住房状态	31458	0.1739	0.3790	0	1
家庭收入	31458	8.7627	0.5962	0	12.2061
家庭支出	31458	8.0434	0.6164	4.2627	11.5129
社区类型	31458	0.7093	0.4541	0	1
河流密度之差	31458	0.0769	0.2042	-0.7646	0.7797
地形起伏度之差	31458	0.0811	0.7680	-3.7099	3.6582
坡度极差之差	31458	0.2854	11.8908	-43.3523	49.7192
到本省省城距离之差	31458	-83.7406	127.7231	-445.4505	445.4505
到他省省城距离之差	31458	103.0576	389.2967	-2226.2890	2219.7890
到海岸线最近距离之差	31458	-0.0780	0.4245	-2.5217	2.5209
到港口最近距离之差	31458	-0.0840	0.4301	-2.5497	2.5522
驾车距离	31458	649.3550	605.6648	0	4339.2350
地理距离	31458	509.8278	498.4908	19.3959	3499.7260
方言距离	31458	1.9352	1.1795	0	3
宗教场所密度之差	31458	1.9352	1.1795	0	3
孔庙遗存数量之差	31458	0.1166	2.5195	-11	11
户籍人口规模之差	31458	6.8057	352.8350	-1281	1352
公共财政收支比之差	31458	-0.0695	0.4810	-0.7392	16.5260
经济距离	31458	3.9866	3.9403	0.0212	64.3690
制度距离	31458	1.4906	0.6719	0.1754	5.7672

四、实证分析

(一) 实证结果

表 2 为实证结果。列 (1) 和列 (4)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 城市间姓氏距离增加 1 个标准差,

移民创业意愿在 1%显著性水平上增加 1.21%，移民创业概率在 10%显著性水平上增加 0.64%。该结果初步支持了假说 2，即姓氏距离会促进移民创业。该结果代表何种经济意义呢？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 年流动人口 3.76 亿人（跨省和省内跨市流动人口分别为 1.25 亿人和 2.51 亿人）。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显示，移民创业比例为 0.4159。计算得到姓氏距离增加 1 个标准差，移民创业人数增加 100 万人（ $37600 \times 0.4159 \times 0.0064$ ），即姓氏距离对移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在经济意义层面显著。

尽管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姓氏距离会促进移民创业，但是基准回归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内生性主要来自反向因果、测量误差和遗漏变量。就反向因果而言，虽然个体姓氏不会轻易发生改变，具有十分稳定的代际传递性，但是改革开放后人口跨地区流动限制的放松，地区层面的姓氏分布会因人口流动发生改变。为此，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利用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受访者姓氏信息和 2008 年全国经济普查中法人姓氏信息构造城市姓氏距离指标，匹配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进行检验，依旧发现姓氏距离会推动移民创业。由于姓氏距离指标时间早于构造移民创业指标时间，不存在事实上的反向因果关系，说明反向因果不是主要的内生性问题。就测量误差而言，本文数据集包括两部分，姓氏距离借助全国工商注册企业法人姓氏信息构造得来，该数据库覆盖了全国 1.73 亿个人口的姓氏信息，具有较好的样本代表性，移民创业依托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构造得来，该调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执行，存在测量偏误的样本较少。同时，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汇报基于其他数据库构造的姓氏距离结果，依旧表明姓氏距离会推动移民创业，减轻了测量误差对因果识别造成的困扰。就遗漏变量而言，姓氏距离和移民创业属于双边特征，遗漏变量主要来自城市间差异和距离特征。该观点在基准回归中得到了印证，表现为相较于仅控制个体和家庭特征而言，随着城市间差异和距离特征变量的加入，姓氏距离对移民创业的影响系数在逐渐减小，说明控制住城市间差异和距离特征对因果识别较为重要。为此，本文在控制住固定效应后，控制了无时间变动特征的城市间差异和有时间变动特征的城市间差距，减轻了遗漏变量担忧。

为进一步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遵循文化经济学的做法构造地理距离思路的工具变量，从明代山西洪洞县移民引起 881 个姓氏外迁的历史事件出发，以流入市与户籍市到山西洪洞县距离之差作为工具变量，以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明朝时期，黄河泛滥、蝗灾盛行和战乱不断等因素导致大量人口流入山西省，造成山西人满为患。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明洪武十三年全国人口 598.73 万人，山西省人口高达 410.35 万人。迫于土地供应矛盾和劳动力供求矛盾等压力，明朝政府开启为期五十余年的山西省移民运动，也称明初大移民、明朝大移民、明初洪洞大移民等。具体而言，明洪武三年至永乐十五年，明朝政府采取遣返、军屯、商屯、民屯、招诱和征派的方式，遵循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要求向外迁徙人口，规定移民必须到山西洪洞县广济寺办理迁移手续，领取凭照川资，按官方指派方向分别迁往全国各地。根据《明史》《明实录》和《日之录之余》等正史及笔记史料记载，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民分布在 30 个省市 2217 个县市，共向外迁徙 881 个姓氏。其中，移民流入河北省 142 个县市，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 109 个县市，山西省 104 个县市，江苏省、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 316 个县市，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182 个县市，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 171 个县市，浙江省、福建省、江西省 227 个县市，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 248 个县市，四川省、内蒙古自治区、青海省 274 个县市，云南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10 个县市，海南省和台湾省 111 个县市，河南省 123 个县市。

本文之所以选择以历史上大规模姓氏人口外迁事件作为当今城市间姓氏距离的工具变量，原因在于本文认为空间分布影响的持久性会塑造“历史—当代”人口分布惯性和地理流动偏好，历史上形成的迁移路径和人口分布格局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代人口流动的地理偏好和网络结构。即便历史上人口流动采用的非自愿派遣方式不同于当代人口流动的自主方式，迁出地地理特征（如距离迁出中心远近）对人口流向的影响仍具有长期地理惯性，表现为基于个人选择行为驱动的当代人口流动会受到历史地理因素（如地理邻近性、血缘联系）的影响。换言之，本文认为流入市和户籍市到山西省洪洞县距离越相近，接收来自山西省洪洞县同姓氏的外迁人口规模越相近，即城市间到山西洪洞县距离之差越大、城市间姓氏距离越大。在此思路下，便可理解工具变量为何与内生变量负相关。同时，到山西洪洞县距离之差属于自然地理特征，不仅与影响移民创业的经济因素无关，而且不随时间的变动而变化，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

表 2 列（2）和列（5）第一阶段结果表明，DWH 统计量在 1%水平上拒绝了无内生性问题的原假设，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和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大于弱工具变量检验的临界值，流入市与户籍市到山西省洪洞县距离之差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减少了姓氏距离，说明工具变量选取合适、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表 2 列（3）和列（6）第二阶段结果表明，城市间姓氏距离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增加了移民创业意愿和移民创业概率，支持了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实证结果

变量	移民创业意愿 (1) OLS	城市间姓氏距离 (2) 第一阶段	移民创业意愿 (3) 第二阶段	移民创业选择 (4) OLS	城市间姓氏距离 (5) 第一阶段	移民创业意愿 (6) 第二阶段
城市间姓氏距离	0.0121*** (0.0033)		0.5176** (0.2340)	0.0064* (0.0034)		0.5796** (0.2681)
到山西省洪洞县距离之差		-0.0107*** (0.0034)			-0.0096*** (0.0031)	
年龄	0.2033*** (0.0186)	-0.0107*** (0.0041)	0.2486*** (0.0333)	0.1898*** (0.0192)	-0.0103*** (0.0038)	0.2391*** (0.0353)
年龄 ²	-0.1760*** (0.0199)	0.0092** (0.0044)	-0.2151*** (0.0330)	-0.1674*** (0.0204)	0.0084** (0.0041)	-0.2080*** (0.0342)
性别	0.0304*** (0.0024)	0.0015*** (0.0005)	0.0240*** (0.0043)	0.0318*** (0.0023)	0.0015*** (0.0004)	0.0245*** (0.0046)
民族	0.0111*** (0.0034)	-0.0002 (0.0011)	0.0118** (0.0057)	0.0120*** (0.0036)	0.0009 (0.0010)	0.0072 (0.0066)
受教育时长	-0.0467*** (0.0030)	-0.0039*** (0.0006)	-0.0305*** (0.0085)	-0.0528*** (0.0031)	-0.0038*** (0.0006)	-0.0348*** (0.0094)
户口类型	0.0102*** (0.0026)	0.0019*** (0.0005)	0.0024 (0.0050)	0.0125*** (0.0026)	0.0020*** (0.0005)	0.0032 (0.0056)
政治面貌	-0.0052** (0.0021)	0.0000 (0.0005)	-0.0052* (0.0029)	-0.0081*** (0.0022)	-0.0001 (0.0005)	-0.0078** (0.0032)
健康状况	0.0056** (0.0025)	0.0002 (0.0005)	0.0049 (0.0032)	0.0050** (0.0025)	0.0001 (0.0005)	0.0046 (0.0033)
婚姻状态	0.0430*** (0.0028)	0.0017*** (0.0006)	0.0359*** (0.0049)	0.0467*** (0.0029)	0.0016*** (0.0005)	0.0392*** (0.0053)
住房状态	-0.0138*** (0.0030)	-0.0003 (0.0006)	-0.0123*** (0.0039)	-0.0032 (0.0030)	0.0001 (0.0005)	-0.0036 (0.0039)
家庭收入	0.0380*** (0.0050)	0.0009 (0.0008)	0.0341*** (0.0060)	0.0385*** (0.0048)	0.0002 (0.0008)	0.0375*** (0.0058)
家庭支出	0.0559*** (0.0053)	-0.0018*** (0.0007)	0.0636*** (0.0067)	0.0588*** (0.0048)	-0.0017*** (0.0006)	0.0671*** (0.0067)
社区类型	-0.0003 (0.0024)	-0.0019*** (0.0005)	0.0075 (0.0047)	-0.0045* (0.0025)	-0.0016*** (0.0005)	0.0030 (0.0048)

续表

变量	移民创业意愿 (1) OLS	城市间姓氏距离 (2) 第一阶段	移民创业意愿 (3) 第二阶段	移民创业选择 (4) OLS	城市间姓氏距离 (5) 第一阶段	移民创业意愿 (6) 第二阶段
河流密度之差	-0.0089* (0.0050)	-0.0080*** (0.0011)	0.0251 (0.0173)	0.0057 (0.0052)	-0.0079*** (0.0011)	0.0436** (0.0194)
地形起伏度之差	0.0194** (0.0079)	0.0032* (0.0017)	0.0096 (0.0110)	0.0244*** (0.0079)	0.0030** (0.0015)	0.0139 (0.0114)
坡度极差之差	0.0095** (0.0037)	0.0013* (0.0007)	0.0034 (0.0053)	0.0080** (0.0037)	0.0011* (0.0006)	0.0020 (0.0055)
到本省份城距离之差	0.0111*** (0.0038)	-0.0005 (0.0009)	0.0144*** (0.0055)	0.0114*** (0.0039)	-0.0005 (0.0008)	0.0147** (0.0058)
到他省份城距离之差	-0.0284*** (0.0083)	-0.0113*** (0.0027)	0.0479 (0.0368)	-0.0291*** (0.0085)	-0.0121*** (0.0025)	0.0580 (0.0421)
到海岸线最近距离之差	0.0066 (0.0194)	0.0199*** (0.0040)	-0.0830* (0.0493)	0.0069 (0.0199)	0.0203*** (0.0038)	-0.0955* (0.0555)
到港口最近距离之差	-0.0544*** (0.0206)	-0.0032 (0.0045)	-0.0662** (0.0274)	-0.0447** (0.0209)	-0.0024 (0.0042)	-0.0592** (0.0288)
驾车距离	0.0678*** (0.0250)	0.0604*** (0.0064)	-0.1882 (0.1233)	0.0595** (0.0254)	0.0580*** (0.0060)	-0.2201 (0.1360)
地理距离	-0.0491** (0.0225)	0.0280*** (0.0059)	-0.1681*** (0.0646)	-0.0438* (0.0229)	0.0293*** (0.0055)	-0.1844** (0.0744)
方言距离	0.0011 (0.0032)	0.0200*** (0.0006)	-0.0833** (0.0392)	0.0022 (0.0032)	0.0208*** (0.0005)	-0.0973** (0.0468)
宗教场所密度之差	-0.0061** (0.0030)	0.0102*** (0.0008)	-0.0494** (0.0208)	-0.0067** (0.0031)	0.0094*** (0.0008)	-0.0523** (0.0222)
孔庙遗存数量之差	0.0182*** (0.0031)	-0.0026*** (0.0007)	0.0291*** (0.0067)	0.0170*** (0.0031)	-0.0025*** (0.0006)	0.0290*** (0.0072)
户籍人口规模之差	-0.0141* (0.0072)	0.0160*** (0.0015)	-0.0841** (0.0339)	-0.0262*** (0.0072)	0.0157*** (0.0014)	-0.1041*** (0.0379)
公共财政收支比之差	0.0317*** (0.0071)	0.0078*** (0.0017)	-0.0025 (0.0182)	0.0203*** (0.0067)	0.0072*** (0.0016)	-0.0155 (0.0191)
经济距离	-0.0064 (0.0061)	-0.0219*** (0.0017)	0.0882* (0.0452)	-0.0072 (0.0064)	-0.0221*** (0.0016)	0.1009* (0.0520)
制度距离	-0.0202*** (0.0039)	0.0147*** (0.0009)	-0.0812*** (0.0289)	-0.0167*** (0.0041)	0.0141*** (0.0009)	-0.0831*** (0.0317)
流入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户籍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DWH 统计量		8.2111***			8.4104***	
Cragg-Donald Wald F		10.938			10.029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10.115			9.460	
样本量	27837	27838	27838	31457	31461	31461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如无特殊说明，下文控制变量、固定效应和标准误设定均同表 2，不再赘述。

（二）稳健性检验

1. 被解释变量稳健性检验。本文将移民创业分为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马俊峰和徐子尧，2023；马俊峰，2025a）。如果就业身份为雇主，则视其为机会型创业者，则将机会型创业赋值为 1，如果就业身份为雇员、家庭帮工和其他，则将机会型创业赋值为 0（不包括自营劳动者）。如果就业身份为雇员，则视其为生存型创业者，则将生存型创业者赋值为 1，如果就业身份为雇主、家庭帮工和其他（不包括雇主），则将生存型创业者赋值为 0。结果表明，城市间姓氏距离在 1%显著性水平上推动了机会型创业，对移民生存型创业的影响不显著，见表 3 列（1）和列（2）。

2. 解释变量稳健性检验。本文以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被访者姓氏信息和 2008 年全国经济普查法定代表人姓氏信息构造城市间姓氏距离指标。结果表明，城市间姓氏距离_2005 分别在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上增加了移民创业意愿和概率，城市间姓氏距离_2008 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增加了移民创业意愿、对移民创业概率的影响不显著，见表 3 列（3）至列（6）。

表 3 变量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机会型创业	(2) 生存型创业	(3) 移民创业意愿	(4) 移民创业选择	(5) 移民创业意愿	(6) 移民创业选择
城市间姓氏距离	0.0162*** (0.0035)	0.0049 (0.0035)				
城市间姓氏距离_2005			0.0085** (0.0033)	0.0100** (0.0037)		
城市间姓氏距离_2008					0.0070** (0.0034)	0.0057 (0.0038)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0210	29624	28260	28260	31929	31929

五、跨市失信机制检验

表 2 所得结论与过往研究持有的姓氏距离通过阻碍社会融入抑制移民创业的观点不同，需要从新的研究背景下寻找解释姓氏距离促进移民创业的依据。为此，本文从跨市失信视角提出姓氏距离促进移民创业的新解释。为检验跨市失信机制，本文利用基于中国企业家调查构建的省份间信任交叉选择矩阵构建流入市对移民信任程度指标，以流入地企业家对外来人口户籍地企业信任程度衡量流入市对外来人口的信任，取值越大代表信任程度越高（马俊峰，2025a）；借助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构造跨市失信案件数量和人均案件数量、跨市失信人口数量和人口比例四个指标。跨市失信案件数量以户籍市人口在流入市失信案件数量表示，跨市失信人均案件数量以户籍市人口在流入市失信案件数量与户籍市人口总数之比表示，跨市失信人口数量以户籍市人口在流入市失信人数表示，跨市失信人口比例以户籍市人口在流入市失信人数占户籍市人口总数之比表示（马俊峰，2025b）。

表 4 为跨市失信机制检验结果，Panel A 以跨市失信案件数量和人均案件数量表示跨市失信，Panel B 以跨市失信人口数量和人口比例表示跨市失信。Panel A 结果表明，城市间姓氏距离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减少了流入市对移民信任程度，流入市对移民信任程度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增加了跨市失信案件数量和人均案件数量，跨市失信案件数量和人均案件数量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减少了移民创业意愿和移民创业概率。Panel B 结果表明，城市间姓氏距离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减少了流入市对移民信任程度，流入市对移民信任程度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增加了跨市失信人口数量和人口比例，跨市失信人口数量分别在 10%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上减少了移民创业意愿和创业概率，跨市失信人口数量和人口比例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减少了移民创业意愿和移民创业概率。由此可知，城市间姓氏距离通过减少流入市对外来人口信任程度，造成跨市失信难度增加和跨市失信行为减少，跨市失信行为减少会缓解流入市对外来人口信用不足或信用缺失的地域偏见，促进移民创业，证实了假说 2。

表 4 跨市失信机制检验

Panel A	(1) 流入市对移民信任程度	(2) 跨市失信案件数量	(3) 跨市失信人均案件数	(4) 移民创业意愿	(5) 移民创业意愿	(6) 移民创业选择	(7) 移民创业选择
城市间姓氏距离	-0.8779*** (0.0710)						
流入市对移民信任程度		50.5626*** (1.5078)	0.0046*** (0.0002)				
跨市失信案件数量				-0.6083*** (0.0917)		-0.6266*** (0.0921)	
跨市失信人均案件数					-0.1919*** (0.0258)		-0.1972*** (0.0261)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1457	31928	31928	28259	28259	31928	31928
Panel B	(1) 流入市对移民信任程度	(2) 跨市失信人口数量	(3) 跨市失信人口比例	(4) 移民创业意愿	(5) 移民创业意愿	(6) 移民创业选择	(7) 移民创业选择
城市间姓氏距离	-0.8779*** (0.0710)						
流入市对移民信任程度		22.6914*** (0.8413)	0.0390*** (0.0016)				
跨市失信人口数量				-0.0461* (0.0237)		-0.0665*** (0.0240)	
跨市失信人口比例					-0.0507*** (0.0194)		-0.0669*** (0.0196)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1457	31928	31928	28259	28259	31928	31928

六、异质性分析

首先，根据户籍市和流入市所处地理位置，以秦岭—淮河线作为划分南北方城市的标准，将流动方向分为同文化群内流动（南方流向南方和北方流向北方）和跨文化群流动（南方流向北方和北方流向南方），考察城市间姓氏距离对同文化群内流动和跨文化群流动移民创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间姓氏距离分别在 1% 和 5% 的显著性水平上增加了同文化群内流动的移民创业意愿和概率，对跨文化群流动的移民创业意愿和概率无显著影响，见表 5 Panel A，说明城市间姓氏距离能否发挥移民创业的推动效应会因文化差异程度而异，即在促进移民创业方面姓氏距离并非越大越好，适度的文化差异（未突破文化群）有利于繁荣移民创业精神。

其次，本文考察了姓氏距离的移民创业推动效应是否因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而异。从地理距离来看，结果表明地理距离与姓氏距离在推动移民创业方面存在替代作用，表现为姓氏距离对移民创业的正向影响在地理距离更小的城市间更明显，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见表 5 Panel B 列（1）和列（2），原因在于地理距离会提高移民创业成本。从制度距离来看，结果表明制度距离与姓氏距离在促进移民创业方面存在互补作用，表现为姓氏距离对移民创业意愿的影响在制度距离更远的城市间更大，且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见表 5 Panel B 列（3）。

表 5 异质性分析

Panel A	同文化群内流动		跨文化群流动	
	(1) 移民创业意愿	(2) 移民创业选择	(3) 移民创业意愿	(4) 移民创业选择
城市间姓氏距离	0.0176*** (0.0041)	0.0092** (0.0041)	0.0014 (0.0100)	0.0073 (0.0103)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5055	29812	3348	3809
Panel B	(1) 移民创业意愿	(2) 移民创业选择	(3) 移民创业意愿	(4) 移民创业选择
城市间姓氏距离	0.0261*** (0.0042)	0.0161*** (0.0043)	0.0118*** (0.0033)	0.0061* (0.0035)
姓氏距离×地理距离	-0.0165*** (0.0028)	-0.0110*** (0.0029)		
地理距离	-0.0491** (0.0226)	-0.0435* (0.0229)		
姓氏距离×制度距离			0.0044* (0.0023)	0.0038 (0.0025)
制度距离			-0.0230*** (0.0043)	-0.0191*** (0.0045)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7837	31457	27837	31457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与现有研究认为文化差异通过阻碍社会融入抑制移民创业的观点不同，本文从跨市失信视角提出以姓氏距离刻画的文化差异会促进移民创业的新解释。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以 1.73 亿条全国工商注册企业法人姓氏信息数据构建的城市间姓氏距离衡量文化差异，结合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数据构建的跨市失信指标，考察姓氏距离如何影响移民创业。研究发现，城市间姓氏距离会推动移民创业，尤其是机会型创业。机制检验表明，姓氏距离通过降低流入市对外来人口的信任程度，增加跨市失信难度、减少跨市失信，缓解地域性信用偏见，促进移民创业。异质性检验表明，姓氏距离对同文化群内流动的移民创业有促进作用，对跨文化群流动的移民创业无显著影响，并且姓氏距离的移民创业推动效应随着地理距离增加而减少，随着制度距离增加而增加。

尽管本文控制了可能影响结果的时变特征和非时变特征，并构造地理距离思路的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但是仍存在因数据受限导致的缺憾。一是由于缺少流动人口追踪数据，本文使用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截面数据研究移民创业，导致无法通过控制时间固定效应来减轻不随时间变动因素的影响。二是由于缺少覆盖全国人口姓氏信息的数据库，本文使用 1.73 亿条全国工商注册企业法人姓氏信息构造城市间姓氏距离指标，可能导致因姓氏源覆盖面不全引起的估计偏差。以上不足有待数据可及性提高后进行弥补。结合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推动全国性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确保各地区各部门之间信用信息能够无障碍流通，为识别异地失信行为搭建信息基础设施平台。研究结论表明，姓氏距离对同文化群内流动的移民创业具有积极作用，尤其是具有就业带动效应的机会型创业，并且减少异地失信是姓氏距离促进移民创业的作用机制，即异地失信会造成流入地对移民产生信用不足的地域偏见，阻碍移民创业。目前，中国缺乏约束异地失信者的法律法规，未能有效制止异地失信和累计失信行为，从而出现失信人员跨区域流动后反复失信的情况。鉴于此，政府应尽快推动信用数据互通，确保各地区、各部门之间信用信息能够无障碍流通，形成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数据库。具体而言，政府应尽快打通各地区、

各部门信用信息共享的制度壁垒,制定统一的数据交换标准和接口规范,通过构建失信行为监测模型,实时监测和分析失信行为的发生,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识别跨区域流动失信人员,为进一步约束异地失信奠定基础。

2. 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的跨区域联动机制,约束“逃窜式”的异地失信行为,为移民创业者扫清地域偏见,繁荣移民创业精神。在已构建的全国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基础上,政府应尽快促成区域间信用评价标准的统一,建立联合惩戒机制,通过加强区域间的信用监管合作的方式,共同对失信主体进行处罚,形成失信联合惩戒的合力,以减轻失信行为跨区域溢出的负外部性。首先,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不仅可以通过制定国家层面的信用法规和政策,确保各地区在信用体系建设上遵循统一的法律框架和政策导向,避免政策碎片化,还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协调机构,如国家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各地区各部门的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确保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地实施。其次,政府应优化跨区域信用评价与服务,可以通过建立统一的信用评价体系,制定统一的信用评价标准和方法,确保各地区在信用评价上保持一致性和公平性,还可以通过提供跨区域信用服务,鼓励信用服务机构开展跨区域业务,为各地区的企业和个人提供便捷的信用查询、认证、咨询等服务。然后,政府应强化跨区域失信联合惩戒,不仅可通过建立联合惩戒机制,各地区对跨区域失信行为应采取联合惩戒措施,如共同限制市场准入、限制融资、限制高消费等,形成强大的失信惩戒合力,还可以通过加强失信联合惩戒的执行力度,确保各项惩戒措施能够得到有效执行,避免出现执行不力或执行不到位的情况。

参考文献

- [1] 丁从明,吉振霖,雷雨,梁甄桥. 方言多样性与市场一体化:基于城市圈的视角[J]. 经济研究, 2018(11):148-164.
- [2] 高翔,龙小宁. 省级行政区划造成的文化差异会影响区域经济吗? [J]. 经济学(季刊), 2016(2):647-674.
- [3] 焦豪,崔瑜,张亚敏.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高技能创业人才吸引[J]. 经济研究, 2023(12):150-166.
- [4] 李经,陈勇吏. 最低工资制度对创业的影响——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研究[J]. 产业经济评论, 2018(2):105-124.
- [5] 李仲达,林建浩,邓虹. 跨越省际移民中的文化壁垒:信息沟通与身份认同[J]. 经济学(季刊), 2021(5):1691-1710.
- [6] 林建浩,辛自强,范佳琳,周先波. 中国省际双边信任模式及其形成机制[J]. 经济学(季刊), 2018(3):1127-1148.
- [7] 林建浩,赵子乐. 均衡发展的隐形壁垒:方言,制度与技术扩散[J]. 经济研究, 2017(9):182-197.
- [8] 刘凤委,李琳,薛云奎. 信任,交易成本与商业信用模式[J]. 经济研究, 2009(8):60-72.
- [9] 马俊峰 a. 地区间信任,社会融入与流动人口创业[J]. 西北人口, 2025(4):81-96.
- [10] 马俊峰 b. 破壁通衢,智联九垓:人口跨市流动与城市间合作创新[J]. 财经研究, 2025(4):79-93.
- [11] 马俊峰,徐子尧.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与全国统一技术市场——基于人口跨市流动与专利转让的研究[J]. 财贸经济, 2025(5):5-23.
- [12] 马俊峰,徐子尧. 迁入地宗族文化如何影响移民创业? ——基于社会融入的视角[J]. 世界经济文汇, 2023(4): 58-82.
- [13] 阮建青,王凌,李垚. 创新差异的基因解释[J]. 管理世界, 2016(6):107-117.
- [14] 唐林,罗小锋,张俊飏. 社会监督,群体认同与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基于面子观念的中介和调节作用[J]. 中国农村观察, 2019(2):18-33.
- [15] 吴晶妹,宋哲泉,梁墨. 市场声誉惩罚失灵的中国方案及其价值——基于环保失信联合惩戒实践的证据[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3(1):96-112.

- [16] 徐子尧, 马俊峰. 社会信用环境如何影响家庭创业[J]. 财经科学, 2022(6):19-35.
- [17] 杨向阳, 潘妍, 童馨乐. “双边”社会关系网络与农户异地创业[J]. 农业技术经济, 2018(9):30-41.
- [18] 叶文平, 李新春, 朱沆. 地区差距, 社会嵌入与移民创业——“过江龙”企业家现象研究[J]. 管理世界, 2018(1): 139-156.
- [19] 余泳泽, 郭梦华, 胡山. 社会失信环境与民营企业成长——来自城市失信人的经验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9):137-155.
- [20] 张博, 范辰辰. 稻作与创业: 中国企业家精神南北差异的文化起源[J]. 财贸经济, 2021(6):71-86.
- [21] 张维迎, 柯荣住. 信任及其解释: 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 经济研究, 2002(10):59-70.
- [22] 周颖刚, 蒙莉娜, 林雪萍. 城市包容性与劳动力的创业选择——基于流动人口的微观视角[J]. 财贸经济, 2020(1): 129-144.
- [23] 周洲, 周丹琪, 冉戎.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影响企业银行借款机理探讨——基于第三方声誉惩罚视角的检验 [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22(11):102-114.
- [24] Adsera A, M, Pytlikova,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Shap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2015, 125(586): 49-81.
- [25] Ahern K R, D, Daminelli and C. Fracassi, “Lost in Translation? The Effect of Cultural Values on Mergers around the World”,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5, 117(1): 165-189.
- [26] Amin S, “Diversity Enforces Social Exclusion: Does Exclusion Never Cease?”, *Journal of Social Inclusion*, 2019, 10(1): 1-22.
- [27] Bai Y, J K, Kung, “Surname Distance and Technology Diffusion: the Case of the Adoption of Maiz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22, 27(4): 569-607.
- [28] Belot M, S, Ederveen, “Cultural Barriers in Migration between OECD Countrie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12, 25: 1077-1105.
- [29] Cheng, Q, H, Wang and Y., Li, “The Effect of Urban Cultural Diversity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2, 74: 101810.
- [30] Fensore, I, S, Legge and L, Schmid, “Ancestr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22, 50(1): 33-51.
- [31] Gokmen, G,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Impac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on Trad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7, 127: 449-458.
- [32] Gorodnichenko, Y, B, Kukharsky, and G., Roland, “Cultural Distance, Firm Boundaries, and Global Sourc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4, 166: 103175.
- [33] Guiso, L, P, Sapienza L, Zingales, “Cultural Biases in Economic Exchang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24(3): 1095-1131.
- [34] Karolyi, G A, “The Gravity of Culture for Finance”,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6, 41: 610-625.
- [35] Krieger, T, L, Renner and J., Ruhose, “Long-Term Relatedness between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Migrant Selec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8, 113: 35-54.
- [36] Lanati, M, A, Venturini,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Migration Choice”,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21, 157(4): 799-852.
- [37] Liu, C Y, L, Ye B, Feng,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Entrepreneurial Transi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9, 52: 681-696.

- [38] Mao, Q L, X. Z, Mao, “Cultural Proximity and Interregional Industrial Linkages: Knowledge Diffusion or Transaction Costs?”, *Regional Studies*, 2023: 1-16.
- [39] Siegel, J I, A N, Licht, S. H, Schwartz, “Egalitarianism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1, 102(3): 621-642.
- [40] Spolaore, E, R, Wacziarg, “The Diffusion of Develop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24(2): 469-529.
- [41] Wei, X, Y, Jiao G, Growe, “Language Skills and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China”,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9, 53: 981-999.
- [42] Yang, H, X, Zhang, “Persistence of Culture: How the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of Origin Contributes to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23, 61(3): 1179-1204.
- [43] Zhang, P, X, Wei, G, Mao, “Cultural Diversity, Social Integration, and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Evidence from the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23:1-21.
- [44] Zhu C, C C, Lee, J, Hong X, Shi, “Multidimensional Cultural Distance and Self-Employment of Internal Migrant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23, 86: 58-81.

How does Surname Distance Affect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An Analysis Based on a Cross-city Default Perspective

JUNFENG MA

(Guangxi University)

Abstract: Large-scale inter-regional population mobility has created the phenomenon of “dragon entrepreneurs”, in which th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of foreigner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locals, which has promoted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of immigrants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Therefore, this paper utilizes a large-scale database containing family name information to construct a city-to-city family name distance indicator, combines the cross-city loss of trust indicator constructed by the national list of defaulted executors, and matches with the national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of the migrant population, to examine how cultural differences portrayed by the family name distance affect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immigrants. Unlike previous studies that explain that cultural differences hinder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from a social integration perspective, this paper finds that cultural differences characterized by surname distance promote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by reducing cross-municipal breach of trust. The explanation behind is that surname distance promotes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by decreasing the level of trust towards immigrants in the inflow city, increasing the difficulty of immigrants to lose credit in the inflow city, decreasing cross-city loss of credit, and alleviating geographic credit bias. Heterogeneity analyses show that surname distance promotes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for those moving within the same cultural group and does not affect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for those moving across cultural groups, and that the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promoting effect of surname distance decreases with increasing geographic distance and increases with increasing institutional distance.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moderate interregional cultural differences enhance labor mobility dynamics across regions and prosper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Key Words: cultural differences;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social credit; regional disparity

[学术编辑: 周冬]